

先锋★中国
XIANFENGZHONGGUO



中国人似乎仍相信重申和强调“韬光养晦”
能继续有助于世界对中国的和平意图和审慎态度放心，
然而事实上，“韬光养晦”现在已变成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最不愿听的中国话语之一。

全球性挑战 与中国

多事之秋与中国的战略需要

GLOBAL CHALLENGES
AND CHINA

时殷弘◆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CHINA

全球性挑战与中国

多事之秋与中国的战略需要

| GLOBAL CHALLENGES
AND CHINA |

时殷弘 ◆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性挑战与中国 / 时殷弘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438 - 6461 - 0

I. 全… II. 时… III. 发展战略 - 研究 - 中国

IV. D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7157 号

全球性挑战与中国

时殷弘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喻 立

装 帧 设 计: 黎 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科地印务公司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14

字 数: 168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461 - 0

定 价: 25.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GLOBAL CHALLENGES AND CHINA

· 目 · 录 ·

现在与未来

中国当代对外战略思想与其较长远的未来	(002)
美国权势、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014)
金融大危机与国际大格局	(025)
中国的辉煌成功与西方的观念演变	(030)
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当代中国	(035)

机遇与挑战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和必要条件	(042)
全球性挑战	(052)
全球性挑战与中国	(070)
多事之秋与中国的战略需要	(079)
中国军事力量发展与其国际政治影响	(087)



GLOBAL CHALLENGES AND CHINA

· 目 · 录 ·

放眼全球

中美中日关系的战略形势和前景	(094)
奥巴马的对外战略方向与中美关系	(100)
中美 G2 不能解决全球问题	(104)
对日关系战略思考和战略实验的新需要	(107)
中国与朝鲜再次核试验和朝鲜半岛未来	(113)
中韩关系中的阴影	(119)
中国—东亚关系中的历史理解问题	(122)

以史为鉴

论大战略的基本原则	(130)
对孙子的克劳塞维茨式批判	(152)
现代政治制度与国家动员	(165)
英德敌对的由来	(182)
冷战的性质与其世界历史意义	(189)
《论列强》和兰克的国际体系观——回顾和展望	(210)



中国当代 对外战略思想与其较长远的未来

自从 30 年前邓小平启动富含伟大创新性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 1992 年他所作的南巡讲话引发中国经济持续腾飞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种种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在这种背景下，可以概览和分析中国的对外战略，理解与先前相比，中国对外战略在基本思想和实践上有什么主要的新特征。

这里将侧重于思想，包括对外战略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根本纲领。从邓小平往后至今，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有关世界政治和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有了一种新的丰富性和有益的复杂性。传统上，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由三大成分构成：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根本信念；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曰中国的现代激进民族主义；关于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思想，亦即“现实政治”（realpolitik）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信念的理解和把握有了与时俱进的重大优化，并且作为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一个潜在但重要的成分，起着增进透视力、丰富理解力和鼓舞终极理想的伟大作用。与此同时，一种可称“新国际主义”的新成分早已被加入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意识形态系统。不仅如此，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民族主义情绪

已经逐渐减弱，中国边疆领土主权完整问题除外。还有，他们的现实主义思想中也增添了某些对中国和世界都大为有益的新内涵。

较具体地说，“新国际主义”是在全球化和中国日益卷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浮现和发展的。这种“新国际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迅速增长着的一些特定的信念——真诚地相信和致力于那些出自各国合理的共同需要的多边合作、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并且相信有益的跨国非政治交往，既因为它们有利于扩大中国国家利益，也由于它们本身的内在价值。“新安全观”和“和谐世界理念”等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新国际主义”的体现。此外，还有得到中国媒体大量宣传和众多学者讨论的中国外交的“多边主义”。显而易见，中国的世界政治观已经部分地接近国际关系思想史上的“理性主义”或“自由国际主义”，既承认总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常见的利益分歧甚至利益对立，同时也认识到存在有双赢或多赢的国际交往，认识到世界政治中各国的那些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规范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应当起更大的作用。

由此，当下的民族主义可被定义为“讲求实际的民族主义”，而且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进、国际影响迅速增大和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加上中国的主体面貌和主体素质的巨大进步，在中国当下的民族主义当中，激愤情感、造反精神及其部分思想产物（缘于中国先前经受外部凌辱和经历剧烈革命），越来越被雍容的自信、审慎的自豪、大战略式的展望以及信心和耐心兼备的“风物长宜放眼量”胸怀取代。

与此同时，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现实政治”观念中也增添了某些新内涵，与先前相比，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利益”的颇大一部分



GLOBAL CHALLENGES AND CHINA

全球性挑战与中国

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互融合或同化。不仅如此，与毛泽东领导时期相比，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根本战略行为特征反映出他们愈益高度成熟和内在均衡，与此相关的是政治实践技能的显著优化。这特别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战略目标方面。他们在非常复杂和富有挑战性的内外环境中做到了可谓头号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国家根本目标应当具备合理、明确、平衡、有限、集中和充分这几项战略性素质。其中，平衡、有限和集中尤为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他们深谙国家的多种利益互相间常有或大或小的紧张、竞争甚至冲突，要确定合理的国家根本目标，就需要尽可能适当平衡这些利益，即对它们各自打上合适的“折扣”，使之构成一套内在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体系，并且使根本战略目标既拥有明确的优先地位，又不过度损伤其他重要目的。他们在国内外各种严重干扰中，避免了目标的“过度伸展”和“不足”，做到既恰当地“韬光养晦”，又恰当地“有所作为”，从而保证了中国的持续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是真正科学、讲求实际和富有道德的。它们从“和平和发展主题”、“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理念”等大概概念中反映出来。它们首先是基于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正在经历的变迁。它们包括：与过去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持续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一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势问题，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表现重要，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全球范围内国家（特别是大国）内部社会形态、基本价值及主要政策观念在保持异质性的同时，同质性显著增多，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和全球性共同问题愈益突出。也就是说，三十年来中国的这些有关世界观和根本

战略观的大概念并非纯属空想或理想，而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重大动向。

讲求实际，不仅是科学实际，而且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实际。因为它基于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行之有效的伟大实践经验，基于中国切实的利益需要和明智的战略选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绝大地依靠和平的国际交往，依靠广义的“软权势”，特别是和平贸易、国际协商和“微笑外交”。虽然此类经验的一大动因（同时也是一大结果）在于前面所说的“新国际主义”，但它在同样大的程度上也出于根本的战略权衡，因为积极弘扬它可以得到重大利益，包括最少的阻力，最小的成本和最可接受的后果。与此相关的一项基本战略常识是：在国际政治中，公开宣告的基本态势、根本目标和政策宣示方式与具体的政策行动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世界秩序观大相径庭，从邓小平以来的上述大概念代表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关于世界政治应有面貌的价值观，宣示了中国自己的世界秩序理想。这价值观既有其历史传统由来，更有其现当代由来。在现当代由来中，最重要的是分别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首要代表的两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国际秩序的现代正义信念，连同他们的国际政治经历。主权独立、国家间平等和民族自决是他们从现当代西方思想中选择出来的最重要原则，弘扬中国以及所有其他弱国的应有权利和正当诉求构成他们最重要的政治作为之一。强国无权干涉弱国内政，各国人民有权自主发展，国际争端的合理解决办法在于平等协商，而非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强权政治，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中的种种重大难题尤其需要广泛和平等的国际合作：这就是当今中国政府主张的国际政治根本规范，也是上述大概念的核心内涵。



GLOBAL CHALLENGES AND CHINA

全球性挑战与中国

同样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根本纲领有了变更。它可以最简要地概括为和平发展。和平发展直接地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中国要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第二，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而不经受过强国间的全面战争和强国间长期的冷战对抗。与此同时，和平发展还间接地意味着第三件事情：中国要争取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头等强国，而不是先前世界现代史上屡见不鲜的迅速崛起而后迅速跌落的强国。

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和平发展有明显的大战略裨益。和平发展主要依靠广义的“软实力”，即和平的、非军事的权势资源和对这些资源的利用。所有这些力量的特征在于其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成本最小和后果最可接受，既有效，又合算。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正在经历重大变迁。在这变迁中，和平发展符合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具有获得伟大成功的根本保障。

在和平发展这一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根本纲领之下，“经济外交”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变得越来越显著，其运用的频度和突出程度近年来急剧增长。起初，它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对美经济外交，尤其是反复进行的、政府主持下对美国工业设备和民航客机的巨量特别采购，这首先是为了重大的政治和战略目的。不久后，还开始了类似的、以巨量特别采购为主要特点之一的对欧经济外交。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欧美在金融、贸易、投资等方面对华依赖的急剧增长，已经与其他一些原因一起，产生了很好的外交效果，例如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对华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类外交效果同样相当重要的还有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结构特殊的经济关系，以俄制先进武器装备的售买和争取俄罗斯对华长期能源供应为其主要内

容。它们对中国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与此同时，近几年中国对分布于几大洲的一些有大量能源及原料资源、或在地缘政治和外交意义方面重要的若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也愈益显著和范围大增，并且成为常见的国际政治话题和国际舆论话题。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某些格外困难和久经周折的问题上，按其情势具体贯彻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和平发展战略尤为紧要，也尤其能够表现它内含的坚定不移、富有耐力和因势利导的特征。当下中国面对的朝鲜半岛问题就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个。无疑，中国近年来在朝鲜核问题上屡遭艰难和挫折，而且这样的经历还会持续下去。然而，它们需要被置于更广的视野和更深的“景深”中，那就是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及其半岛政策表现密切相连的区域地缘政治经济全局和长久未来。由此呈现出来的图景显得对中国有利得多。最具决定性的大事态是中国近年来崛起为具有巨量国际经济联系的巨型经济大国，并且由此具备了规模效能非先前可比的区域政治影响资源。它将导致一个前景，即中国迟早将成为对朝鲜半岛影响最大的国家。

中国多年来的对朝和对韩政策行为从主要方面看，有利于中国的半岛影响力的保存、积累和建设。中国在坚持朝鲜非核化的同时，始终避免全然疏离朝鲜，以格外的毅力长期忍耐主要由对方导致的关系困难；中国持之以恒地以最大援助国身份援助朝鲜，同时操作对朝贸易和投资。对于韩国，中国除了一直积极发展经济关系外，还致力于控制和消减中韩间的争执和争端，特别是近一两年来谋求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政治关系。中国对朝韩两国的可谓“齐头并进”的政策努力表明，中国在以特有的耐心和耐力，“从容”追求自己在半岛的、与半岛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密切相连的长远利益。“路遥知马力”，这句中国成语是对半岛国际政治未来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最

好比拟。

如前所述，和平发展部分地取决于世界政治基本性质的变迁。然而，这变迁虽大但仍有限。权势政治依然是当代和未来可预见的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大维度，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核心—外围关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也同样如此。战争的价值衰减趋势远远没有发展到使之消除殆尽的地步。领土—军事安全仍有重大意义，先进的武装力量和坚强的国防意志仍是在军事强权等安全威胁面前捍卫自己的一种必需。军事力量、军事意志和军事体制效能最为紧要；而且它们在和平时期遏阻最坏情况发生的根本威慑作用也至关重要。历史和理论都昭示，国家大战略在和平时期有一项根本任务，那就是念念不忘军事安全和备战。

由于必须坚持和平发展这根本战略纲领，也由于同样必须大力确保和提升中国发展的“军事方面”，因而在军事能力发展问题上，中国既要坚持军事现当代化和发展中远程权势投射能力，又要继续将军力发展置于国家大战略的总体框架内，更仔细地平衡主战略与次战略的关系、增长军事实力与消减不利反应的关系。或者说，中国在加强国力方面，一个头等重要、也头等紧迫的任务，在于本着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全面和大幅度地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改善和建设，同时将这与发展和平负责、稳健进取的对外政策在大战略层次上协调起来。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需要较多地以柔性方式在中国军事透明度问题上与美国周旋，争取促使五角大楼和美国防务知识界内的对华温和势力逐渐增强，并且准备在未来开始与美国进行有关军事领域的战略性谈判（包括军备控制谈判）。

不仅军事力量、军事意志和军事体制效能依然至关重要，而且在全球化趋势、发达强国和跨国资本面前，发展中国家有着诸多易受伤

害性，防范、控制和消减它们关系到独立自主、国家安全和社
会健康，并且与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这两项任务紧密相连。2008 年急剧
爆发和迅速席卷全球的这场金融大风浪灾害性地展示了全球化的病
变和调控“真空”。全球化已经发展到使世界经济、尤其是世界金融
复杂得极难准确认识、成功预测和有效调控，同时大大诱惑和便利了
（借用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说中的话）在全球化金融体系中占支配性优
势的“部分人的贪婪和不负责任”。这场席卷全球的大风浪特别强烈
地提醒中国，要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和更深刻地反思过去近二十
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形成的也许最大的失误：中国对发达国家的
市场、资本、技术甚至投资场所（美国国债！）形成了那么大的依
赖性，与此同时所有这些过大依赖作为重大因素加剧了中国现有发
展模式的不健康和状态的不健康。什么是依赖性？依赖性就是
“敏感性”，甚至是“易受伤害性”。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应该
开始高度重视和动手改革，同时也不应粗糙简单地对待。

讲到这里，就需要更广泛地谈论中国今后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
的头号战略任务，至少是头等战略任务之一。那就是缔造最大最重要的
狭义“软权力”。狭义的软权力是指生活方式、价值观、体制功
效、社会面貌、国策纲领、行事方式等等的吸引力或鼓舞力，连同制
造这种影响的技能。现代世界史证明，重大的历史性创新是一国成为
可持续的世界强国的一项根本先决条件，它关系到该国对世界历史的
贡献、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和对本国人民的鼓舞力，而所有这些都
是建立在价值的层次上，或者说在最大的狭义软权力的层次上。自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世界已有哪些价值贡献？

几个世纪以来到今天，现代价值观可被概括为“经济成长”、
“自由”、“社会正义”以及近几十年来愈益突出的“生态保护”。改



GLOBAL CHALLENGES AND CHINA

全球性挑战与中国

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经济成长”范畴，但这个价值观远非出自中国的创造。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现在已经相当强烈地感到这一成就迄今为止代价过高，亦即在过大程度上损害了社会主义和牺牲了生态保护。至于“自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致实现了中国 13 亿人口的经济“自由”，这无疑是世界史上自由的巨大扩展，是中国近 30 年的一项非常伟大的成就。然而，不仅经济“自由”本身同样不是中国的价值创新，而且这自由的实现同样在“社会正义”和“生态保护”方面代价过高，何况在其他一些基本自由的充分实现方面，中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简言之，迄今为止中国依然比较缺少最大的狭义软权力，这是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性挑战。就近期或者中期的基本目标而言，这首先意味着能否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尽快实现中国现行很不平衡的发展模式的转换。

粗略地说，改革开放的根本精神或首要经验大概就是与时俱进，或曰经过创新性的调整去适应时代变迁和世界变迁。“创新适应”（creative adaptation）是最重要的战略素质，对内和对外两方面俱如此。就当今中国而言，它的一个根本前提，在于发现和辨识改革开放以来与伟大成就并存或交织的重大瓶颈问题，特别是经济内在平衡、社会公正和生态保护方面的问题，连同当前由美欧金融危机和美欧日经济衰退所表现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趋势。可以注意到，最近一两年来，在中国的外交成就硕果累累、国际影响和国际作用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在世界上遇到的新麻烦越来越多样化和分散化。其中，金融、贸易、生态、“全球公民社会”等领域的若干新动态可能预示某些长远的新动向。假如我们局限于在过去造就了伟大成就的基本判断和战略，没有记住世界政治大局和潮流的能动性，没有记住适应这能动性的必要，没有高度具备勇于实验、敏于调整的战略素

质，那么我们有可能陷入一两代或两三代人时间内先盛后衰的局面。

大思想家阿诺尔德·托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依据对世界众多文明的漫长历史的统一思考，非常着重地讲过类似的道理：文明的成长是个连续的过程，对此“新的创造性调整”最为紧要；“停滞了的社会曾赢得了这第一轮（生成性的创新），但由此保证了它们自己在下一轮的失败”，因为“它们造就了倔强难御和僵硬不灵的体制，后者阻绝了任何进一步的社会发展”。成长的关键在于“从现有成就进至新的奋斗，从解决一个难题进至面对另一个难题，从短暂的停滞进至重新运动”；要始终如此，“就必须有一种锐气，它承载被挑战方……面对新挑战，并且由此激励他做出新回应”。援引两千五百年前埃斯库罗斯的著名悲剧，托因比将这锐气——做出创新性调整以成功回应新挑战而必需的锐气——称作“普罗米修斯锐气”^①

最简略地说，历史性成功的根本保障在于“普罗米修斯锐气”。目前和今后一段历史时期里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力保中国经济较高增长速度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鉴于中国内外瓶颈问题的一大共同来源，以胡锦涛主席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为纲，努力转换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的发展成为真正健康和确实可持续的。跨过了这个大门槛，中国就能在世界政治中继续大幅度腾升。需要坚决确立一个战略观念乃至相应的战略规划本身，那就是应对眼前紧迫之事固然要只争朝夕，贯彻科学发展观也一样要只争朝夕。正确的大战略的基本要求之一在于坚决地将最重要、最优先的利益或目标当作关注重

^①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a new edition revised and abridged by the author and Jane Caplan (New York: Weathervane Books, 1972), pp. 127 - 140. 引语见 pp. 131, 132, 135, 136.



GLOBAL CHALLENGES AND CHINA

全球性挑战与中国

心和努力焦点，争取排除或控制一切对实现根本目标的可能的干扰。用伟大的战争哲学家和战略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在实践中总是有“成千上万分心之事”，总是有“令人混淆、首尾不一和含糊不清的种种情势”，它们往往使得坚持原本的战略目的变得很困难，这就要求作为大战略统帅的政治领导人不被“甩出轨道”，并以其洞察力和足够的精力克服无数下属中间必有的相反倾向。^①

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最大最严重的“分心之事”就是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按照现存的不健康、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去大力刺激经济，防止来势凶猛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恶劣影响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从而引起一系列可能是冲击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困难。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紧迫的经济任务，但它的最大代价是可能加剧国家原本要大力消减的问题，如中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生态恶化等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国务的真正考验就在于处理严峻的两难，而目前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发现、认识和坚信极为重要的一点，即严峻的两难仍然留下了余地 and 机会——尽可能较广泛较深入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便给中国造就真正大有希望的未来。

全世界现在都在谈论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减和美国权势的相对衰落，同时比过去更多地谈论中国的强劲崛起。根本的问题是中国能否保持可持续的崛起？是否能避免崛起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无法有效应对新问题而先盛后衰？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讲得非常好。他特别提出昨天的先进性不能代替今

^① Peter Paret, “The Genesis of On War”, in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6 – 17; Clausewitz, *On War*, p. 580; Bernard Brodie, “A Guide to the Reading of On War”, in Clausewitz, *On War*, pp. 656 – 657.

天的先进性，今天的先进性不能保证明天的先进性。应该继续秉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积极创新，应对挑战和居安思危的精神，保障中国未来的发展。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往好的方向发展，美国将不得不以比过去更有弹性的态度面对中国的崛起。然而，中国如果保持到目前为止那种不可真正持续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就可能在未来一个不太远的时候中止。总之，未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美国衰落，中国由于不能解决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问题也衰落；另一种可能是，美国解决不了它的根本问题，不仅是经济、金融方面的巨大困难和在中东西亚的严重困境，而且是基本生活方式的问题，而中国既能保持经济的较高速增长，又能真正秉持科学发展观大致解决社会不公正、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生态恶化问题，那么中国就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强也最有生机的国家。

中国的重大瓶颈问题与发端于美欧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困局一起，强烈地昭示世界现在处于一个“真空”，那就是没有任何大国现在能为其社会提供良好和有真正持续活力的生活方式。换言之，世界各强的根本问题，都在于使各自的社会拥有这样的生活方式，这也蕴含世界主要难题的解决方向。它们之中究竟哪个能做到或先做到这一点现在尚无答案，但这将在更长远的意义上决定世界的权势格局。这就是我们当今和可预见的未来里在世界政治经济中从事的最根本的竞争，我们有希望并且一定要争取在这场竞争中名列前茅。